

校园风云录

——学生运动史话

周 倜 编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校园风云录

周 偶 编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登林
封面设计：张志刚

校园风云录

周 侗 编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278千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11114·67

定价1.60元

从“五四”到“一二九”

——代序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页，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是爱国学生带头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

这一历史事实是有象征意义的。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正是青年学生“担任了先锋队的角色”；学生运动往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是整个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前奏。

五四运动以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进而接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们在报刊上抨击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宣扬民主，提倡科学，李大钊等少数先进分子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在当时黑暗的中国，了解这种新思潮的人还很少，但是他们的热情勇敢的宣传鼓动，确实为现代中国第一次革命群众运动的爆发做了舆论准备。

强烈要求变革旧秩序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结果；而运动的爆发往往需要某种激怒群众、促使

群众奋起斗争的导火线。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分配战利品的“巴黎和会”上欺负中国。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武装攻占了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的中国领土青岛市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区。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又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了将使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初，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实质上是打胜了的帝国主义国家分配战利品的分赃会议。当时的中国虽然“自身难保”，备受帝国主义欺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对德宣战，因此也算是一个“战胜国”，不胜荣幸地派出代表去参加“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等项要求。后来，由于旅欧中国学生的强烈要求，又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被日本趁机夺去的德国在我山东省霸占的地盘。

不料，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竟然在巴黎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至于“二十一条”的争议，则借口不属会议讨论的范围而置之不理。对于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和约，北洋军阀政府居然准备签字认可。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国人十分愤慨，首先采取抗议行动的是爱国的青年学生。北京学生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在五月七日举行“国耻纪念会”，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五月七日，是使每一个爱国者感到奇耻大辱的日子。因为一九一五

年的这一天，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签订“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学生们选定这一天举行激励民心的“国耻纪念日”是很有号召力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夜晚，北京大学学生和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礼堂开会，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輿。曹汝霖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曾经手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章宗祥是驻日公使，曾经手出卖胶济铁路。陆宗輿是币制局总裁、前驻日公使，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群众运动起来了，这几个卖国贼便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众矢之的。那天晚上，讲演的学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当讲到“领土破坏了，中国就亡了”的时候，同学们愤恨得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有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手指，撕下衣襟，用自己的鲜血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上，目击者无不热血沸腾，同仇敌忾。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扬言要用武力解散学生们预定在五月七日召开的“国耻纪念会”，北大学生和各校代表连夜商量对策，决定提前三天，次日即到天安门集会游行。当天夜里，住在北大西斋等宿舍的同学通宵未眠，满怀着忧国忧民的痛苦和渴望战斗的激情，埋头准备武器：竹竿、旗子、标语、传单、地图、漫画等等。

第二天，五月四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汇文大学、工业专科学校等十四所学校的学生数千人陆续来到天安门前。这个古老的皇城禁地，辛亥革命以后才允许平民百姓通行的广场，第一次变成了爱国群众举行盛大集会的场所。学

生们用竹竿挑着引人注目的白旗，旗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诛卖国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头可断，领土不可失”。过路的人纷纷止步围观，天安门前的人越聚越多。热血青年登高讲演，宣读大会宣言，散发传单。传单中悲愤地写道：“中国的大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传单号召全国同胞奋起斗争，“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大声疾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同胞们，起来呀！”

爱国学生振聋发聩一声吼，惊动了京师朝野各界，步军统领、警察总监和教育部官员纷纷赶来“劝阻”，“警告”学生不要游行。警察总监带着武装军警威胁群众，扬言要立即解散学生队伍，说这是“大总统的命令”。学生们愤怒高呼：“打倒卖国贼！”反动官吏们见众怒难犯，民心可畏，只好溜走了。

数千学生从天安门出发，在前门大街、东长安街、米市大街等闹市区游行示威，高呼爱国口号。示威群众潮水般涌向赵家楼胡同，一下子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代表叫曹贼出来答话，曹宅却紧闭大门，无人理睬。同学们有的围着守门军警进行宣传，有的用竹竿把曹家房子上的瓦挑下来，然后抬起地上的碎砖烂瓦向院子里扔去，打破了临街的窗玻璃。几个勇敢的学生从窗口爬进去，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到处搜寻曹贼。在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客厅里，竟然高悬着日本天皇的“御像”，学生们气愤得立即把它捣毁。只听乒乒乓乓一阵响，曹汝霖家的豪华摆设、家俱全被愤怒的

群众砸烂了。爱国学生边砸边骂：这都是曹贼用卖国的钱买来的，全砸了也难消我们心头之恨！

老奸巨滑的曹汝霖，爬出后窗逃走了。来访曹汝霖的章宗祥也想趁乱溜走，不料被群众发觉了。爱国青年揪住他，七手八脚地狠揍一顿，把这个卖国贼打倒在地。

在搜寻曹汝霖、痛打章宗祥的时候，有个北大的学生气愤地放了一把火。这把火迅猛地燃烧起来了。目击者只有鼓掌叫好的，没有帮忙救火的，眼看着烈焰腾空，一会儿就烧毁了曹汝霖的住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故事。

傍晚，当同学们正在撤离赵家楼的时候，大队军警赶来了，逮捕了三十多个示威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社会舆论强烈同情被捕青年，北京学生全体罢课，抗议镇压爱国群众，各地学生纷纷声援北京学生。北洋政府害怕群众在“五七国耻纪念日”掀起更大风暴，连忙在五月七日早晨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各校学生代表坐着大汽车去警察厅欢迎被捕战友胜利归来。许多市民夹道欢呼，向年轻的爱国者致敬。

五四运动象一场震撼封建统治的大地震，它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其来势之迅猛、声威之浩大是任何反动势力也压制不住的。五月七日那一天，北洋政府出动了数千名警察、步兵、骑兵，重点防范天安门一带，禁止群众集会，北京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临时改变开会地址，与军阀的高压政策作斗争。与此同时，上海、济南等地的学生召开了“国耻纪念会”，天津、太原、长沙等地的学生举行了

示威游行，……到处响起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吼声。

北洋政府一面死保曹汝霖等卖国贼，一面继续派军警监视学生行动，禁止爱国集会，查封进步报刊。这样，就更加激怒了群众。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严正指出：“必须惩办曹、章、陆，以除国贼；山东问题决不许签字……”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也陆续宣告罢课，运动的规模迅速扩大。

学生罢课以后做什么？组织起来上街讲演，以唤起民众。北京学生组织了许多讲演队，分头深入到大街小巷、剧场饭店，当众发表充满爱国激情的讲演，各界群众深受感动。反动政府派出大批步兵、马队，往来如梭，穿街过巷，故意冲散听众，破坏爱国宣传。警察特务跟踪爱国青年，不断有人被捕。爱国青年热血沸腾，不怕坐牢，在恐怖气氛中奔走呼号，坚持战斗。

六月初那几天，参加讲演的学生一天比一天多，被捕的人也越来越多。监狱容纳不下了，北大的法科、理科校舍被军警当作临时监狱。大学里军警密布，校门外军队安营扎寨，戒备森严，北京城变成了恐怖世界。爱国青年们发扬前仆后继、共赴国难的斗争精神，六月五日又出动了四、五千人上街讲演。许多学生随身携带行李，时刻准备被捕坐牢。

在整个社会中，青年学生显然是少数。他们手无寸铁，抵抗着反动武装军警的镇压，面对着黑暗的社会发出呐喊，他们屡受挫折，似乎是在孤军奋战。但是，他们的爱国呼声好似晨钟，唤醒了无数的群众；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

建统治的思想行动好似火种，迅速点燃了革命的燎原之火。六月三日以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广大工人、市民参加了战斗：上海工人大罢工，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商人罢市，……五四运动突破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范 围，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工学商联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上千万群众参加了各种抗议活动。一场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直接威胁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北洋政府被迫改变策略，对群众运动做出让步。六月五日，他们下了一道紧急撤兵令，包围北大、监禁学生的军警仓皇撤走，接着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公开道歉。六月十日，他们下令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六月底，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使帝国主义国家感到震惊。至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第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又是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传播先进思想、进步文化的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帮助人们打破几千年来的精神枷锁发挥了重大作用。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造就了一批领袖人物，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等，都是搞学生运动出身，并从“五四”开始自己革命生涯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并培养了一批干部。凡此种种，都说明首先表现为学生运动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开拓了一个新时代。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学生运动往往是整个革命运动的先驱和号角。

五卅运动的特点是工人和学生并肩战斗，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汇合成滔天的巨浪。导火线是在上海的日本纱厂资本家悍然镇压工人罢工，开枪打死了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同志，打伤中国工人十余人。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首先走上街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上散发传单，发表讲演，进行爱国反帝宣传，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抗议租界巡捕无理逮捕中国学生。这时，英国巡捕又到处抓人，仅南京路老闸捕房就关押了一百多名中国学生。下午三点左右，一万多名学生、市民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头子竟下令向徒手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十一人，打伤数十人，南京路上洒满了爱国人民的鲜血。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立即号召群众，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把反帝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

野蛮镇压吓不倒人民。在五卅惨案的第二天，上海一千多学生和女工毅然上街，在军警密布的南京路上游行示威，在铁甲车、机关枪前散发传单，进行反帝宣传。随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群众抗议大会，二十万人参加了反帝集会和大示威。在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参加“沪案后援会”，并举行反帝示威游行。“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吼声传遍

全国，为大革命局面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在革命史上的三一八运动，又是青年学生打头阵，冲锋在前。一九二六年初，奉系军阀李景林、张宗昌的部队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天津附近打仗。奉系军阀是受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当奉系军阀打了败仗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出面援助。三月十二日，两艘日本军舰开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奋起开枪还击，打死了一名日本大尉。三月十六日，英、美、日、法、意、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除防御，否则就要采取“必要之行动”，并限令在三月十八日正午以前答复。北京总工会、学联等群众团体发出紧急通知，号召各界人民起来支持国民军，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

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共产党员、中法大学学生陈毅，是北京市学联的党团书记，北京学生的领袖之一。三月十七日，在北京各团体联席会议上，陈毅等四人被推选为代表，去向段祺瑞政府请愿，抗议日本军舰侵犯大沽口，要求驱逐干涉中国事务的八国公使。段祺瑞政府的卫兵蛮横对待来请愿的群众代表，陈毅气愤地警告北洋军阀的秘书长说：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反对人民的人，如清朝皇帝、袁世凯之流都垮了台，段祺瑞也保不住。

第二天，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涌向天安门，去参加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同志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表爱国演说，他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

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会后，各界群众万余人举行反帝示威游行。下午一点多钟，部分游行队伍约两千人，来到东城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请愿，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段祺瑞竟然命令卫队向徒手群众开枪。霎时间，枪声大作，血肉横飞，许多人中弹倒地。枪声过后，成群的军阀兵冲了过来，挥舞着大刀、棍棒，朝着请愿群众乱砍乱打。当场打死五十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这就是使段祺瑞遗臭万年的“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是在此时此地被杀害的。北方党组织的领导人李大钊同志的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陈毅同志被人群挤在疯狂扫射的两挺机关枪之间，幸免于难。在那十分危急时刻，李大钊、陈毅等同志镇定地指挥群众撤退。

几天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大学为“三一八”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会场上高悬醒目横幅：“烈士之血，革命之花”。陈毅作为大会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段祺瑞镇压爱国运动、屠杀人民的血腥暴行。

当时在北京的鲁迅先生连续写了六篇文章评论三一八惨案，他把三月十八日这个血腥的日子，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先生深刻地指出：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三·一八”的枪声，爱国青年的鲜血，帮助民众认清了北洋军阀反对人民、镇压人民的狰狞面目，促使更多的人奋起斗争。到头来，总是沉默的多数力量大于不可一世的独夫民贼；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在沉默中爆发，而不会在沉默中灭亡。想当年，下令开枪的段祺瑞多么狂妄、多么嚣张，可是不到两年时间，北洋军阀的统治就被大革命的浪潮冲垮了。历史学家郭沫若说过：“‘三·一八’是北伐的先驱，‘一二九’是抗日的前奏。”历史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论断是很有见地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蒋介石对外不抵抗，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坚持打内战，公然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均处以妨害邦交罪”。一九三五年，日本军队大举入关，威胁北平、天津。侵略者到处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代表、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和日寇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签订了秘密的“何梅协定”，无耻地答应了日寇提出的全部要求，把对华北的控制权拱手送给了日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离北平仅四十里的通州，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北平附近也成了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任意横行的地方，甚至北平城里也有日本驻屯军在活动。华北已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人们满腔悲愤地描绘当时的情景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北平

的学生沉痛地说：“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当我国面临着亡国灭种威胁的生死关头，首先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武装抗日，以挽救祖国危亡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在“爱国有罪”的国民党统治区，首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并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滔天巨浪的，是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发动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年十月，北上抗日的工农红军，奇迹般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和红军长征胜利这两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遍全国，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面临沦为亡国奴悲惨命运的华北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真有如是在无边的黑暗中忽然见到了光明。当时，北平的爱国学生，正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酝酿发动一场抗日救国运动，以冲破国民党统治区“不许抗日”的沉闷空气。那一年的冬天，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彭涛、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姚依林（清华）、郭明秋（女一中）、黄敬（北大）等同志，常在西单辟才胡同一家洋车行里召开秘密会议，分析研究当时的形势和群众情绪，都认为必须有所行动；他们决定先以请愿的方式，

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运动，以唤起更多的群众，并向反动统治者示威。

正当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十二月九日，国民党政府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实现“华北特殊化”。这一新的卖国步骤，激怒了每一个爱国者，成了爆发爱国运动的导火线。中共北平临委和北平学联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在十二月九日这一天，发动各校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成立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

国民党军政机关获悉北平学生要请愿游行，立即派出大批军警把守城门路口，并封锁学校。不料，青年学生怀着誓将热血献给危急中的祖国的决心，一旦采取集体行动，便义无反顾地走上街头，即使派更多的军警也阻挡不住了。九日黎明，西郊清华、燕京等校的学生步行进城。黄诚等同志带领清华同学，沿着铁路线前进；陈翰伯等同志带领燕京同学，顺着田间小道走。他们机智地避开了布置在公路大道上的军警，在西直门前汇合了。

西直门城门紧闭，城上城下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学生代表与军警交涉、讲理，军警还是不让学生进城。同学们满腔悲愤地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在刺骨的寒风中，上千名大学生对着阻拦的军警和围观的市民，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爱国自由！”“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响应共产党“八一宣言”号召的公开的集体行动，这是在“不许侈谈抗日”的白色恐怖下发出的惊天动地

的呐喊：

东北大学的学生对当亡国奴的痛苦有更深切的体会，他们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一致决定参加请愿游行，并选举宋黎同志为总指挥。他们不顾军警的阻拦，手挽着手，集体冲出学校，向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办公地点新华门进发。东北大学的队伍走近西四牌楼时，遇到几百名军警阻拦，学生高呼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进。军警挥舞棍棒殴打学生，用刀背砍学生，同学们奋不顾身地冲破了封锁线。当他们带着伤痕血迹，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到达新华门的时候，受到了各校学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大学的校门也被军警封锁了，董毓华、白乙化等同志采取“声东击西”、化整为零战术，一面派代表到门口与军警交涉，一面分头越墙而出，然后再集结队伍。他们在途中接应被军警封锁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学生，帮助她们冲出校门，一齐奔向新华门。

前些天，曾经有一批又一批的汉奸，跑到新华门来要求“华北自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把他们待如上宾，又迎又送，“亲切接见”，叙谈甚欢；这一天，爱国学生来要求抗日救国，新华门却紧闭着，警戒森严，学生们被拒之门外。新华门前布置着几百名武装军警，摆着警车、摩托车，架着机关枪，真可谓杀气腾腾，如临大敌。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女一中、镜湖中学等校学生二、三千人，聚集在新华门前，高呼抗日